

新自由主義下開放（政府）資料 與商品化的困境分析

黃昭謀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mail : exercise@cc.shu.edu.tw

關鍵詞：開放（政府）資料；資訊政策；新自由主義；商品化

【摘要】

開放（政府）資料是近期重要的資訊政策之一，行政部門強調對資料的鬆綁近用，能夠創造極高的經濟產值。此一新自由主義觀點，重視國家整體財富累積，但從商品化推動，卻易產生「追求產值與經濟效益」、「球員兼裁判的操作方式」，以及「經濟成果會向下滲透」的迷思。本文透過文獻、網路資源等文本分析，爬梳臺灣官方推動歷程和探討商品化的困境，並建議開放（政府）資料不應以成為商品為首要或唯一考量，而需聚焦使用者需求與社會正義，並構築創新的文化與環境。

研究背景

2014 年底，甫就任的執政團隊提出以「開放資料」、「大數據」和「群眾外包」，做為振興經濟與提升施政品質手段，並定調今年為「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深化應用元年，公部門須「制度化」加速釋出政府資訊（林安妮，2014）。消息經媒體披露，並未見各界太多負評，反不謀同辭的期盼政府擴大資料釋出範圍與速度，其因一者民間社團長期呼籲，期望藉資料公開來參與和監督公共政策，二者借鑑英、美等國經驗，推動開放資料可助建立透明（transparency）治理形象，還能刺激經濟增長以及企業創新（The World Bank, 2014）。除此當然尚有掌握網路民意的深遠考量，現今使用者因技術之力，對社會議題的涉入參與，能在短時間內形成龐

大壓力，行政單位費心規劃的政策，常因與公眾間「資訊不對稱」，一旦有所疑問又未能及時回應，形成的負面聲浪則橫生阻力。為逆轉困境，開放資料不僅能裨益政府了解民眾需求，還可因公民參與、共創協作的附加價值（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

臺灣過去數年對該活動的投入，就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OKFN）所發佈「開放資料指數」（open data index）評比來看，2014 年「名列全球第 11 名，在亞太地區僅落後澳洲、紐西蘭、印度」（林安妮，2015）。亮眼成績背後，是長期以建立資訊國家為導向、發展資通產業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並以此致力資料處理、流通與使用之結果；而在「政策為經濟發展服務」趨勢下，公部門對開放資料的立場，亦傾向「資料加值應用」或能否發展出「商業模式」。僅就行政院下轄兩個主要促動機構：「國家發展委員會」制定開放資料作業原則與交換標準，「經濟部工業局」連結產業需求，來活化開放資料的應用與加值（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在組織任務的功能協調上即可略窺。而愈為明晰的政策論述，還可見 2012 年官方籌辦的「我國公開資料加值 Open Data 推動策略會議」，行政院科技會報（2012b, p. 4）指陳歐盟 27 國開放政府資料「所產生之市場直接規模產值，從 2008 年統計為 280 億歐元，至 2010 年已增加為 320 億歐元；間接規模產值預估可達 1,400 億歐元」，以及舉荷蘭「地質部門」為例，因資訊公開而「需新增 15,000 名全

職員」，利用產值與就業機會，將開放資料形塑一種新興產業的想像。

問題意識

持平來看，前述公部門作為實無可厚非，因為新產業概念萌芽之初不但需公眾與業界共同關注，來創造議題熱度和市場投入；同時也得向行政系統爭取資源，以利推廣擴大經營規模，而扣連數值增長，則是藉人為手段創造經濟發展可能性。然借鑑過往，公部門對資料的鬆綁、開放，仍承襲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經濟符碼，透過國家與私人企業攜手，雖可因補貼和貿易保護而快速壯大，但所陷入的困境，很可能是成果尚未分享於大眾之前，就已經為特定的資料經濟業者掌握。換言之，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政府為治理 (governance) 而實施資料蒐集，其來源與生產成本皆出自如你我般的納稅人，那麼若以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思維推動開放資料會帶來何種影響？亦即，當從「誰損失、誰獲利」的立基點出發，所關切的非僅資料收費問題，而是當業者和掌握開放權力的部門聚焦市場獲利，資料價值高低取決於消費動能、後者又常被預設為釋出與再應用的判準。況且，資料解讀和工具操作牽涉技術知識，能力相對欠缺的公民要「參與」則得仰賴開發人員跨越門檻，資料的價值性於此經常成為決定條件。舉例來說，近期冬旱嚴重，經濟部即宣布第一期稻作有四萬多公頃須休耕 (彭宣雅, 2014)，社會大眾與農民對政府水資源調度固無從置喙，可主管單位亦未明確公布各區域水情和後續處置資訊，然因休耕總計超過 30 億新臺幣的補償金則須由全民埋單。先不論政府對水資源分配是否合理，蓄積於公部門的資料若能釋出，便可由使用者轉製內容或開發行動載具以降低相關損失。

僅此，本文旨在爬梳臺灣近年開放 (政府) 資料政策歷程，同時從新自由主義的脈絡檢視商品化論述及其困境。要言之，新自由主義「既是種經濟理論，又是種政策立場 (policy stance)」(Kotz, 2002, p. 64)，按美國學者 Chomsky (1999, p. 19) 的說法，是承襲自「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基礎上，所建立的學說體系。」這一思想觀點強調國家最小干預原則與個體理性算計引導經濟發展，嘗試限縮國家政治權力，並透過議會代議制度來保障個人的自由

和財產權。然而在美國，在 1930 年以後自由主義卻改變涵義，「依賴於國家而不是私人的志願安排來達到目標，…它的主旨成為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Friedman, 1962/2009, p. 8)；換言之，1933 年羅斯福總統就任後推出「新政」(The New Deal)，政府對經濟調節措施增加，金融貨幣改革與公共工程投入，降低失業率、提高薪資種種作為使政府在計畫經濟中具備重要角色，「以福利和平等的名義」，廿世紀美國走向與古典自由主義完全相反路徑，是後者「所反對的國家干涉和家長主義政策的再度出現」(Friedman, Friedman, 1962/2009, p. 9)。另外，二次大戰後美國為了國際貨幣兌換、收支調節與資產儲備，透過《布列敦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為基礎，先後主導國際貨幣基金 (IMF)、世界貿易組織 (WTO)、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等全球性金融機構設立，關稅貿易與區域市場開放，藉由國際談判協議掃除障礙，市場經濟轉向自由放任風氣也在 70 年代達到高峰，美國雷根政府和英國的柴契爾夫人攜手，主張除了走向全球資本市場，別無其他選擇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George, 1999)，因此「開放」的意識形態不僅內隱於國家鬆綁公共服務行業和鼓勵私人企業投入，私有財產的增加帶動國家總體經濟規模擴張，也成為開發中國家追求經濟發展的學習標的。

研究方法

即使經濟作為上的「開放」隱含不對等競爭，但也伴隨市場選項增加、參與者變多等諸多想像，故當此一用語被置入資訊政策修飾詞彙，賦予外界的是：透明、問責 (accountability)、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公民與政治參與、創新 (innovation) 等美好願景 (Huijboom & Van den Broek, 2011; Linders, 2012; Henninger, 2013; Bates, 2014b; 宋餘俠、李國田, 2012; 陳怡君, 2013)。可必須認清「技術雖有助提升政府服務，卻無法取代公眾問責 (public accountability)」(Yu & Robinson, 2012, p. 182)，行政部門釋出大量的資料集 (datasets) 只是善盡義務 (liability)，提供公民監督施政機會，但不等同於「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更何況就資本主義市場原則來看，當以創造就業機會和獲利為發展手段，雖為某些組織合理化資本積累、卻也潛藏著社

會財富分配不均，而後者常影響「國家總產出（national output）與經濟穩定」，也對經濟效率和成長帶來衝擊（Stiglitz, 2012）。

故為求對「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有更全面理解，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除了爬梳文獻，並蒐集近期（民 101~104 年）行政單位的網路資源進行文本分析，內容範圍包括：「行政院科技會報」、「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立法院公報」等公部門出版刊物，同時藉由「世界銀行」、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美國 Obama 政府「Data.gov」上的相關論述，釐清活動發展緣起與其定位可能衍生的問題。下文，將先從英美各國在新自由主義風潮下推動資訊公開的過程談起。

文獻分析

雖然開放（政府）資料運動於近期相續出現，但自由獲取資訊的理想，實為「公共圖書館宣言」（Public Library Manifesto）中所揭「任何人可免費而平等的使用」精神之體現。不過隨著資訊技術更迭，90 年代網路開放商業用途後，除了圖書館受其浸染，另外從經濟到政治各層面，也都捲入以資通技術做為傳遞服務手段的過程，僅就「北美地區電子商務交易」的數值觀之，其市場規模從 1998 年的 430 億美元，至 2002 年已成長至 780 億美元（陳至哲，2000；周樹林等人，2003）。Harvey（2005）指出，這波以國家為主體、資通技術為基底的經濟浪潮，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機構串聯，加速跨國市場交易的頻率次數，也讓生產和勞動力的配置能在全球範圍中移動，而為利於全球指導決策，則愈發仰賴資訊技術；因此他提醒「新自由主義是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主張人類幸福的提升，是在一種以穩固的私人財產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為特徵的制度結構，解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國家的角色則是創造並保持一種適合上述實踐的制度框架」（Harvey, 2005, p. 2-3）。

上述說法為觀察行政部門推動開放資料時所扮演角色，提供詮釋進徑，所謂「透明治理」固然是期

望，愈為要者是此舉如何創造經濟潛能。欲達於此，非僅將資料公諸網路便可實現，鑑之 2009 年美國的「Data.gov」、2010 年英國的「Data.gov.uk」等平台相繼推出前，已有不少歐美國民間社團倡議政府資料公開，其中不乏為公益目的，但亦有如 Google 這類網路企業將 GPS 等政府開放數據用於不斷開發新的應用程序，或像 The Climate（2013 年為孟山都收購）等氣候風險管理業者，運用氣象數據開發出農產品保險服務（The World Bank, 2014, ; Gurin, 2014/2015）。故若要對開放資料運動有全觀認識，則須先拉大視野關注新自由主義下的（政府）資料公開經過。

基本上，就語詞概念來看「公開資料」（public data）與「開放資料」，此二者雖互為表裡、也都聚焦「資料」本身，但仍有不同，差別在前者傾向公開揭露、民眾知的權利，後者還包括「再利用」與開放授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再就資料的「開放形式」，若援用 Berners-Lee（2009）「資料連結」（Linked data）一文的五星標準，「公開資料」屬於一到二顆星，包含可在網上獲得任何形式文件（如 DOC、XML、PDF…），以及具備機器可讀取（machine-readable）的結構。「開放資料」涵蓋前兩項，資料評等則是三星以上，文件偏向「非專屬資料格式（non-proprietary format，如 CSV）」，而四星級的資料是「使用 W3C 開放標準（如 RDF、SPARQL）來識別物件」，五星級的資料則是串連公、私領域，能「連結自己和他人的資料並提供背景脈絡」，這亦凸顯「公開資料」關注近用讀取，而「開放資料」重視資料鏈結，能直接使用並結合其他資料集。更進一步來說，2007 年 12 月 30 位「開放資料」的倡導者齊聚美國加州，會後提出了「完整性」（complete）、「首要性」（primary）、「即時性」（timely）、「可近用」（accessible）、「可機讀」（machine processable）、「無差別」（non-discriminatory）、「非專屬」（non-proprietary）、「免授權」（license free）八項原則作為公部門政策參考（Ubaldi, 2013）。目前不僅美、英等八大工業國已於 2013 年簽署「開放資料憲章」（Open Data Charter），臺灣亦於 2012 年制訂「政府資料開放資料集管理要項」等相關辦法，以「資料開放民眾與企業運用」、「免費為原則、收

費為例外」、「資料大量、自動化而有系統的釋放與交換」的方式，繼續推動資料開放」（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b）。

美、英資訊公開政策歷程

然此非一步致之，當政府身兼資料蒐集者和擁有者，「開放」公民參與必然面臨決策過程攤在陽光下，而愈為直接的壓力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重大利益，決定資訊流通（information flow）的特性，並控制著資訊流通」（Schiller, 1975/1996, p. 51）。故若擴大歷史視野，1966 年美國通過「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雖名為「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理念，聲稱「民主國家的人民享有主權（sovereign），故資訊歸屬於公眾」（Schudson, 2014, p. 1）；但部分合法豁免（exemptions）資訊仍對公眾採取保密，此所導致結果是「將戰爭機器、影響帝國的外交決策權、公司實踐及資源決策置於資訊特權的控制之下」（Schiller, 1975/1996, p. 67）。1971 年《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因為連載經濟學者 Daniel Ellsberg 提供越戰的祕密文件，而受到美國國防部攔阻刊登，此案雖於提交司法後判定國防部敗訴，凸顯人民知的權利受到重視，但實則未否定國家可採取禁止手段，僅是強調欠缺證據支持（Edgar & Schmidt, 1973）。

「資訊自由法」之後幾經修訂，1996 年的「電子資訊公開法修正案」（The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6, E-FOIA）將資訊範圍擴及「電子形式製作或儲存的檔案」，同時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將電子資料上線供公眾瀏覽使用。可是 2001 年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很多政府機構即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資訊從網站撤下，Mart（2009）就指出，這些文件一經在網路公佈就進入公共領域，公眾有權近用，而且「修正案」明訂揭露的資料記錄不分格式，網頁自不例外，被撤除的訊息只要有兩位以上申請者（requestor）依法要求回復，便須張貼於電子閱覽室（reading rooms），故籲請公益組織和大眾採取行動，以保障公民獲取政府訊息的權利。

至於大洋彼岸，英國於 70 年代工黨（Labour）執政時便曾提出資訊自由法的構想，但因卡拉漢政府

（Callaghan government）受困於國內經濟問題、在 1979 年大選失利而告中止（Halonen, 2012）。接手的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為脫困境，開始由國家與私人企業攜手投入資訊產業，在 1982 年「資訊技術開幕會議」的演講，她特別提到「從 1979 年迄今，Racal（電子商品業者）的營業額成長三倍，從 2.2 億英鎊成長至 6.5 億；Plessey（生產半導體）在同時期由 6.5 億英鎊擴增至近 10 億英鎊……」（Thatcher, 1982）。這些被點名的公司，在 80 年代大量承接國防部訂單，「1984 年 GEC, Plessey, Ferranti, Thorn EMI 和 Racal 等五家公司，與國防部簽訂超過 1 億英鎊的合約；而國防部佔其公司銷售額的比例，在 1986 年 GEC 為 31%、Plessey 是 38%、Racal 的 37%、Ferranti 的 60%，Thorn EMI 的 9%」（Saxenian, 1989, p. 461）。

國家支持資訊產業發展，不代表對資料開放採取相同立場。1992 年工黨提出「知情權草案」（Right to Know Bill），幾經討論後仍遭否決；但為回應外界，隔年（1993）官方出版「開放政府白皮書」（Open Government White Paper），當中提及公民可近用政府的「健康及安全資訊」、「個人資料檔案」兩項權利，然未獲得落實，行政部門操作上仍可藉「實施細則」（Code of Practice）規避排除（Raab, 1994）。1997 年大選前夕，工黨和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都承諾若獲勝將制訂「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保守黨（Conservatives）只保證（pledge）會將前述白皮書的兩項權利予以立法，「資訊自由法」則絲毫不提。雖然結局由工黨勝出，但採取措施是發佈「你的知情權」（Your Right to Know）白皮書，文中再度重申資訊自由公開，範圍更涵括「私有化的公共設施」（privatised utilities），可是並未予以列入國會立法議程（Campaign f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n.d.）。嗣後，1998 年 7 月由 240 位下院議員聯名，要求政府將「資訊自由法」排入下年度議程，行政部門才於 1999 年提出草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Bill）向公眾諮詢，並在 2000 年 11 月獲得王室批准（Royal Assent）正式施行（Friedman, 1962/2009）。

臺灣資訊公開政策歷程

反觀臺灣，1979 年行政院通過「經濟建設十年計畫」之際，我們幾與英國同步發展資訊產業。爾後

機關使用電腦作業益增，研考會曾於 1982 年委託翁岳生進行「資訊立法之研究」，不過時值戒嚴，令該報告陳述資訊保密「對國家安全之維護可說是當務之急」，而政府步調與先進國家「有相當之距離」也就可解；可是文中對於公部門把宣揚政績的新聞當作資訊公開、公務員對於文件「機密之意義與範圍」缺乏劃分依據，以及欠缺「行政處分前的公聽（public hearing）或公告（notice）制度」，亦有所批評（翁岳生，1985）。

1993、1994 年雖先後有立法委員黃爾璇、程建人提出「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惜皆未獲通過（葉俊榮，1996；湯德宗，2006）。然隨著社會風氣不變，1996 年同樣由研考會委託葉俊榮執行「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研究」，即主張「謀求資訊公開需求與供給的調和」、「主動公開為原則」、「制度法制化」，以及掌握資訊「國際化」、「電子化」的趨勢（葉俊榮，1996）。1999 年「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開始送交立法，「函送第四、第五、第六屆立法院審議」，費時六年期間歷經政黨輪替，才於 2005 年 12 月三讀通過（湯德宗，2006）。

設立資訊公開法，是國家走向民主化，從法律上承認人們對公部門資訊具有「知的權利」，而給予「一般性的政府資訊接觸請求權」（a general right of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此係指除特定限制外，公民能全面接觸政府持有、保管之資訊（湯德宗，2006），故操作實踐以「主動公開為原則」，方利於大眾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行政院法務部，2005）。可是財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7）曾以行政院及其直轄機關共 40 個單位網站為主要調查對象，檢視其「應主動公開資訊」項目，結果發現只有 18 個機關網站設有「政府資訊公開專區」，…但點進去後，資料完全闕如，顯見雖有法源，但缺乏公開意識仍難使透明政府實現。然臺灣長期為經濟發展投入資通訊技術（ICTs）建置，亦構築完備的使用環境，加以大眾參與線上公共審議風氣日升，對於公部門的資訊需求已不再被動等待發佈，而轉向要求主動揭露。

研究結果

沿法規制定過程鋪陳出來的曲折前景，顯現政府對開放資料的推動並非表象般平順。儘管依 Vleugels（2011）調查，迄 2011 年全球已有 89 個國家陸續制訂資訊公開法案，但不能否認「政府的資訊活動，無論是公開的活動亦或是秘密活動，其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私人經濟和提高國家的軍事力量。這種軍事力量，轉而又提高公司在國外的營利能力」（Schiller, 1975/1996, p. 49）。Stiglitz（1999, p. 2）就表示「（美國）政府越戰期間所投入的要比其所宣稱來的多，但問題是不知道究竟投入多少，也不知誰知道確切答案」，可是當政府掌握資訊秘而不宣，既「形成對特定知識領域的獨佔（exclusive control），也同時擴張自身權力」。換句話說，行政機器掌握資料釋出方式與比例，要如何或多大程度開放也就成為各種力量拉鋸場域。

新公共管理與開放（政府）資料

英國資訊公開法的制定過程，最大阻力實來自政黨作為。回顧 80 年代初期，柴契爾夫人的舉措「不只是對經濟危機作出回應」，而是透過「市場化、工業重整和經濟理性化等連串激進改革議程（radical agenda of reform）」，對英國的經濟和社會帶來決定性的轉變（McGrew, 1992, p. 104，彼時「只要能提高行政效率，有效降低財政赤字的方案，都成為改革的可行方案」（郭耀昌，2004, p. 9）；而政府治理績效往往反映在選舉結果，不同立場政黨、非營利組織（NPO）與公私機構和行政部門的競合關係，使後者不再扮演提供公共服務的唯一角色，同時民心向背也會令其避免武斷決策與權威式分配資源。此外，由資通技術建構之訊息流通網絡，加速改變行政部門運作方式，上述採取「顧客導向」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思維，「在英國的實踐方式包括：藉由外包（outsourcing）、私有化和其他地方分權（decentralisation）形式，來分散公共服務的供應；以及在公共機構（public bodies）間、公部門、私部門和第三部門（third sectors）競爭的制度化」（Bates, 2014a）。

公共服務受市場驅動的結果是大規模民營化，各種旨趣的利益團體參與協作固可刺激行政效能，但要讓不同目標的參與者步調一致，也相對意味政府必須減少干預和釋出更多訊息。2009年美國總統歐巴馬(B. Obama)剛上任就簽署《透明與開放政府備忘錄》(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Memorandum)，內中提及「努力確保公眾信任，建立透明、公眾參與和協作的系統。…行政部門和機構應利用新技術，將其運作和決策資訊上網，並隨時向公眾提供」(Obama, 2009)。同年底聯邦政府依此公佈《開放政府指令》(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具體要求「各級單位由資深管理人員主導，基於單位之各別專業，訂定該單位之開放政府計畫說明」，並且限期盤點資料和上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2012年5月官方再提出《數位政府策略》(Digital Government Strategy)，目標設訂為：(1)讓人民能在任何地點、時間和設備，藉行動載具近用高品質數位政府資訊；(2)掌握機遇以智能、安全和可負擔的(affordable)方式，取得經營設備、應用和資料；(3)釋放政府資料力量帶動創新；同時還以「資訊層」(Information Layer，提供結構化的資料與非結構化的內容)、「平台層」(Platform Layer，管理資訊的系統和程序，如網頁API)、「展示層」(Presentation Layer，資訊組織和提供給客戶的方式)三重架構建造數位政府(Obama, 2012)，其意在於納入私部門和民間社團參與服務，進而考核行政部門績效表現。

開放且不設限的近用政府資料，使資訊密集型產業快速增長，依世界銀行報告，「美國紐約大學針對500家運用政府開放資料的調查研究，有回覆的180家業者中大多是新公司，有2/3成立未滿五年、有一半超過10名員工」(The World Bank, 2014, p. 10-11)。此則反映資料確實蘊藏被轉化為市場買賣商品潛能，例證還可見「英國國家測繪局(Ordnance Survey, OS)」，這一公辦民營化的機構「估計每年可支援1,000億英鎊的經濟活動」(Mayo & Steinberg, 2007)，但其爭議在於2006年為商業地圖網站「streetmap」提供最新圖資，但像地方郵政或部分行車導航系統無法負擔較高授權費用者，僅能使用舊的地圖訊息(Arthur, 2006)，「衛報」(The Guardian)於是發起

「解放我們的資料」(Free Our Data)系列報導，主張政府挹注的資訊蒐集應該免費提供各界使用。

來自媒體與民間社團多方壓力，如mySociety在2007年出版《資訊的力量報告》(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Report)，讓政府開始在地方、中央分別設置「公共資料小組」(Local Public Data Panel)與公開透明委員會(Transparency Board)，以加速「行政部門在設定時間前，釋放關鍵的公共數據集」(Halonen, 2012)。2011年財政大臣G. Osborne在「秋季聲明」(Autumn Statement)中，除交代氣象局、交通局、地政局(Land Registry)的資料將以「開放政府授權條款」(Open Government Licence)釋出免費使用外，還強調未來五年政府將提撥1,000萬英鎊的經費成立「開放資料協會」(Open Data Institute)，「協助企業運用政府所發布的公開資料」(Treasury, 2011; Margetts, 2014)，後者於2012年正式啟動。檢視這波政府開放近用資料過程，Davies(2010, p. 2)分析在英國「主要壓力來源，在於關注公部門資訊商業再使用(re-use)的遊說團體，和致力資訊自由化與公開政府的活動人士」，這些分布在私部門的微型企業(micro-enterprise)、中小型企業，地區與國家公部門機構以及學術單位，對開放(政府)資料的動機可分如下六種：

1. 聚焦於政府：能更好的了解政府以提高效率和問責
2. 聚焦於技術創新：旨在創造新平台與工具，以及語意網(semantic-web)和資料連結技術
3. 聚焦於獎勵：尋求讚譽(recognition)和營利
4. 數位化政府：尋求政府運作與效能改善的技術驅動力
5. 問題解決：運用開放政府資料以滿足特定挑戰
6. 社會/公部門企業：運用開放政府資料提供服務

再看看臺灣推動「開放(政府)資料」，除前述2012年初行政院科技會報籌辦的策略會議，隨後在當年11月行政院3322次院會決議「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可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滿足產業界需求，對於各級政府間或各部會間之決策品質均有助益」，故交研考會積極規劃，

並於次年（2013）2月23日公佈「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行政院科技會報，2012a；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李治安、林誠夏、莊庭瑞，2014，p. 65）。該項作業原則在總說明中指陳立法宗旨為「增進政府資訊的可用性，提供給民間加值應用，進而帶動民間創新資訊加值服務」，因此可視為從前述資訊公開「知的權利」基礎，延伸到「用的權益」（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a）。

另外，行政院既對下轄機關開放資料集件數納入績效管考，且若使用者「對已開放政府資料之完整性及時效性提出精進建議」而未獲回應時，研考會還可介入協調，故由民間需求推動、公部門配合下，迄2015年7月統計已上線8,973個資料集（政府資料開放平台，2015）。儘管如此，民間社團對開放資料的「速度」和「品質」仍有相當期待，所以今年（2015）4月副院長張善政先生與Open Data聯盟等團體座談時，特別回應會「依資料產製週期定期更新；資料集應採開放格式（如JSON等），若屬即時性資料，宜評估系統介接可行性，建置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方式」（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b）。依此看來，我們的發展歷程與英国有相似之處，皆在於官方作為受民間力量驅動才形成政策，只是在內求績效、外求經濟表現的驅動下，聚焦資料商機的有無或高低，仍難免陷入商品化的迷思。

商品化迷思

2013年10月「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anyika et al., 2013）發佈研究報告，文中表述「教育、交通、消費性產品、電力、石油與瓦斯能源、醫療照護、消費金融」等領域的開放資料每年可創造超過3兆美元經濟價值。儘管底下附註此為推估而非實際價值，但已足以引發諸多想像；尤其是國外文獻相繼指出，「歐洲較具限制性的資料政策，投資95億美元在天氣資料上能回收680億美元；相較於美國投資190億能回收7,500億美元」（Reilly & Smith, 2013），動輒有近10倍到數十倍的回收，也就無怪乎行政部門會問：「告訴我們哪些是需要優先開放，具有高經濟價值的資料」（張維志，2014）。

時序稍向前，行政院科技會報在2012年開放資料推動策略會議的新聞稿中，熱切表述「政府資訊透過公開加值可以變成手機、網路上的熱門軟體，便民與創造新產業一舉兩得，在歐洲被認定約有1.2兆產值，若加計間接產值更可高達約5.3兆臺幣。在資通訊產業典範移轉，由硬體轉向軟體應用、商業模式之際，政府資料也可以變黃金」（行政院科技會報，2012a）。強調私部門與公眾對政府資訊有龐大需求，可創造商機倒也非誇大，因為同年10月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甫上線即流量過大而無法運作，便可見一斑。類似的說法還可見2014年9月經濟部舉辦「Open Data 跨域整合年會」，行政部門再度聲稱「在推動開放資料產業應用，...透過創新應用競賽，成功協助7家新創公司成立，另外，輔導16家業者應用政府資料發展創新商業服務，預估帶動產值與投資額將達1.8億元」（經濟部工業局，2014）。

可是數字背後迷思，首先浮現「追求產值與經濟效益」。基本上，政府資料含藏諸多訊息，包括可直接使用或需經轉化格式等不同組成，故開放時除需把關資料品質和維護隱私、還得兼顧參與的公平性；於此，方可為產業服務時還能在公民實踐過程改善社會環境。但從商業應用出發，所侷限者常在產值規模與經濟效益上打轉，至於「開放」程度或是否涉及施政「透明」則非重點。要言之，雖然Margetts（2014）強調透明從來就不是開放資料的首要目標，因為一般大眾並不具備解讀政府資訊能力，得賴專家才知核心或如何應用，可若想憑藉商品化為手段，就會像前述行政部門強調經濟數字，不斷重申已開放多少資料集或協助成立若干新創企業；對資料想像誤差結果，不單是把公開與開放資料混為一談，也可能導致各部門應付了事，釋出資料卻未必關心誰或在何種情境下被運用。

其次，行政部門在經費有限與追求績效表現的狀況下，為求起產業示範作用，常有「球員兼裁判」的操作方式，具法人或官股身分的公司，較民間業者容易取得公部門標案或成為合作對象。例如具法人色彩的「台北市電腦同業公會」，從資策會與經濟

部接手「資訊月」、「電腦展」、「電玩展」等活動，也同樣承攬了經濟部標案「資料服務產業應用推動計畫」；另外衛福部在食安風暴後所架設「食品業者登錄平台」則由「關貿網路」得標，後者前身是1990年行政院核定成立的「貨物通關自動化規劃推行小組」，主要建置進出口通關自動化系統，以協助企業藉網路完成通關和關稅繳納作業，1996年轉型民營化，財政部仍為最大法人股東。這雖未必違法、卻存在競爭立基差異，而且正因彼此關係緊密，故甚少檢討與公布計畫執行成效，此亦相對證實 Harvey (2005, p. 159) 所言：「資訊技術是新自由主義的特權技術，它更適合於投機活動 (speculative activity) 和極大化短期市場契約，而非促進生產」。

第三，預期開放資料的「經濟成果會向下滲透 (trickle down)」，乃是根本盲點。大體上，新自由主義追求「自由市場」與市場導向成長，藉技術研發創新的大量刺激是創造財富的基本原則，爰此可有助新型企業設置，同時也能吸引更多人力投入，從而使利益均勻擴散到社會各個層面。這一預設若證諸現實，Self (2000, p. 27) 以英國為例，說明「在1979-1991年間，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所得增加60%，收入最低的10%、所得降低近20%」；至於在臺灣，依行政院主計處 (2014) 公佈2013年社會指標統計表，從「1998-2013年間，可支配所得最高與最低五分位組的差距從5.5倍增加到6.1倍，而在16年間低所得組不增反減 (從310,865降至309,459)；高所得則是曲折攀升 (從1,714,097上升到1,882,680)」。

上述數字反映社會總體財富或許增加了，可是相對集中於少數人手中，那麼開放資料若成為一種產業，資料「決定價值的標準，由產品所能服務的個人與社會之需要，轉換到了由市場所能帶來的結果」(Mosco, 1996/1998, p. 212)，換句話說，資料只要符合「市場價值」就值得被「開放」、反之即可能暫時或長期擱置，資料「再使用」如果也用這邏輯，部分技術缺乏者的需求似乎也只會消極期待某天獲得關注。

結語

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的首頁上有兩個提問，除了「什麼是開放政府資料」，另一個則是「為何需要

開放政府資料？」其主張有三：「透明，透明不僅是近用，還包括分享與再使用 (reuse)」、「釋出社會與商業價值」、「參與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OKFN, n.d.)。誠然，政府資料僅是開放資料運動的一環，但民間聲音主張透明，實在是因為開放政府資料，能夠讓公民有權監督或施加壓力使政府更具效能，至於商業價值僅是其一而非全部。臺灣官方推動開放資料起步雖晚，不過今年(2015)初以來，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先後和「open data」聯盟、「零時政府」(g0v.tw)、「臺灣地理資訊學會」…等民間社團接觸，並於四月份由國發會規劃「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初稿撰寫，以網路意見徵詢和實體會議進行全民協作，同時藉 YouTube 等社群平台讓行政官員與公民直接對話，或可視為公部門願意主動和社會成員分享想法以解決問題，然在資訊落差、議題框定的情況下，還是對具體討論產生限制 (如智慧國土包含「智慧防災」、「智慧城鄉」和「智慧運輸」三大項，但光是防災就牽涉中央地方諸多組織部門權責協調，以及各種層級資訊的公開透明)，故「開放」、「參與」非單方面想像，學界與民間社團鼓動公民意識、適時發掘不被重視議題，公部門願意透過各種審議方式，在政策制訂初期釋出空間討論，多向度串接才能令資料開放發揮治理效益。

留意開放資料的經濟效益並無不對，因為行政部門所蒐羅的種種訊息確實蘊藏開發應用潛能，只不過當以商品化為前提，似乎就陷入經濟發展的迷思，追求產值亦被視為理所當然，「迷思並不隱藏任何事物，它的功能是扭曲，並不是使事物消失」(Barthes, 1957/1997, p. 181)。於此市場化傾向，使得開放政府資料原本能形成一個良好的治理框架讓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現在政府往往首先把公民視為“客戶”(customers)，而不是“合作夥伴”(partners)，過分強調這一概念，卻模糊了公民行動和參與的意義」(Linders, 2012, p. 451)；直言之，苟以滿足「客戶需求」為先，有時便易忽略行為的正當性而幫助強者掠奪弱者，或將政府資料視為協商資源，只在對己有利時機或能產生效益才順勢開放，英國制訂「資訊自由法」的經過可供前車之鑑。

容或有人主張，政府資訊每個人都有同等權利再使用，但矛盾也在於當這些新創商品或服務若經法

令（如智慧財產權）許可市場獨佔，所設定的範圍是否會排擠他人近用；尤其當政府同時兼有資料開放權力與開發者角色時，那麼從市場角度衍生的思考，就會關注如何收費計價，也會使上述問題愈形複雜。要之，開放（政府）資料並非不能成為商品，而是不應以成為商品為首要或唯一考量，「公部門的資訊生產、收集和處理就如同專利發明一般，都是種知識產權；用知識產權使之歸於私人所有，如同挪用公共財產為私人所占用，其嚴重性本質上並沒什麼不同」（Stiglitz, 1999, p. 7）。

僅此，商品化氛圍中的開放（政府）資料，實不能樂觀預期效益必然普及於社會，反而必須在此進程中，留心使用者需求和兼顧公平正義，睽諸過往民間社團努力，Mayo 與 Steinberg（2007, p. 4）就懇切的建議政府「為確保公眾利益，應為其準備豐富的（即使有時是不準確的）資訊，並協助被排除的群體取得優勢」。凡此，皆須回歸行政層面，而且愈為要者在於構築創新的文化與環境，「廿一世紀的創新經濟中，政府可能必須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建立基礎研究，為宏偉大業奠基；形塑研究的方向，…以及建立更均衡的智慧財產體制，提供的誘因可讓社會獲得更大的利益，而無須付出附帶的代價，包括專利壟斷的代價」（Stiglitz, 2010/2010, p. 293），這是公部門無所旁貸的責任，既不能仰賴市場機制，也需要嚴肅面對，開放而透明的治理需要與社群攜手取得信任感，才有辦法根本改變相互對待的方式。

致謝

感謝匿名評審寶貴意見，對本文內容修訂大有貢獻，在此致謝。然觀點疏漏不足之處，文責由作者自負。

參考文獻

- Arthur, C. (2006, April, 20). Living on the street with no name.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06/apr/20/society.guardianweeklytechnologysection>
- Bates, J. (2014a).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policy for the contemporary neoliberal state: The case

-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in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1(3), 388-395.
- Bates, J. (2014b, October 2). The progressive ideals behind Open Government Data are being used to further interests of the neoliberal state. *Impact of social science*. Retrieved from <http://blogs.lse.ac.uk/impactofsocialsciences/2014/10/02/open-government-data-and-the-neoliberal-state/>
- Berners-Lee, T. (2009). *Linked data*. Retrieved from <http://www.w3.org/DesignIssues/LinkedData.html>
- Campaign f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n. d.). *History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the U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foi.org.uk/about-foi/history-of-freedom-of-information-in-the-uk/>
- Chomsky, N. (1999).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 Davies, T. (2010). *Open data, democracy and public sector reform. A look at open government data use from data.gov.uk*. Retrieved from <http://www.opendataimpacts.net/report/wp-content/uploads/2010/08/How-is-open-government-data-being-used-in-practice.pdf>
- Edgar, H., & Schmidt, B. C. (1973). The espionage statutes and publication of defense inform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73(5), 929-1087.
- George, S. (1999, March).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conomic Sovereignty in a Globalising World Bangkok. Retrieved from <http://www.globalexchange.org/resources/econ101/neoliberalismhist>
- Halonen, A. (2012). *Being open about data: Analysis of the UK open data policies and applicability of open data*. London: Finish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en.vedur.is/media/loftslag/Halonen_Being_open_about_data_excerpt.pdf
-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nninger, M. (2013). The value and challenges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5(3), 75-95.
- Huijboom, N., & Van den Broek, T. (2011). Open data: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strate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ePractice*, 12(1), 4-16.

- Kotz, D. M. (2002). Globalization and neoliberalism. *Rethinking Marxism*, 14(2), 64-79.
- Linders, D. (2012). From e-government to we-government: Defining a typology for citizen co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9(4), 446-454.
- Margetts, H. (2014). Data, data everywhere: Open data versus big data in the quest for transparency. In N. Bowles, J. T. Hamilton, & D. A. L. Levy (Eds.), *Transparency in politics and the media* (pp. 167-178).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 Mart, S. N. (2009). The Internet's public domain: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Internet Law*, 12. Retrieved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285262
- Mayo, E., & Steinberg, T. (2007).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Cabinet Offi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opsi.gov.uk/advice/poi/power-of-information-review.pdf>
- McGrew, A. (1992). The state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In J. Allen, P. Braham, & P. G Lewis (E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f modernity* (pp. 65-126). UK: Polity press.
- Manyika, J., Chui, M., Farrell, D., Van Kuiken, S., Groves, P., & Doshi, E. A. (2013). Open data: Unlocking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with liquid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business_technology/open_data_unlocking_innovation_and_performance_with_liquid_information
- Obama, B. (2009).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TransparencyandOpenGovernment
- Obama, B. (2012). Digital government: Building a 21st century platform to better service American peopl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egov/digital-government/digital-government.html>
- OKFN (n.d.). Why open government data. Retrieved from <http://opengovernmentdata.org/>
- Raab, C. D. (1994). Open government: Policy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policy.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65(3), 340-347.
- Reilly, K. M. A. & Smith, M. L. (2013). The emergence of open development in a network society. In M. L. Smith, & K. M. A. Reilly (Eds.), *Open development: Networked innovation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p.15-50). MA.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Saxenian, A. (1989). The cheshire cat's grin: Innova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ambridge case. *Economy and Society*, 18(4), 448-477.
- Schudson, M. (2014). Origins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N. Bowles, J. T. Hamilton, & D. A. L. Levy (Eds.), *Transparency in politics and the media : Accountability and open government* (pp. 1-18).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 Self, P. (2000). *Rolling back the market: Economic dogma and political choi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tiglitz, J. E. (1999). On liberty, the right to know, and public discourse: 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public life. Retrieved from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NEWS/Resources/oxford-amnesty.pdf>
- Stiglitz, J. E.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 Thatcher, M. (1982). Speech opening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5067>
- The World Bank (2014). Open data for economic growth. Retrieved from <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Open-Data-for-Economic-Growth.pdf>
- Treasury, H. M. (2011). Further detail on open data measures in the autumn statement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pen-data-measures-in-the-autumn-statement-2011>
- Ubaldi, B. (2013). Open government data: Towards empirical analysis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initiatives. Paris: OECD Working Papers on Public Governance.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787/5k46bj4f03s7-en>
- Vleugels, R. (2011). Overview of all FOI law around the world - 2011 upda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llrx.com/features/foilawsoverview.htm>

- Yu, H. & Robinson, D.G. (2012). The new ambiguity of "open government". 59 *UCLA Law Review Disc.* 178. Retrieved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12489
- 羅蘭·巴特 (Barthes, R.) (1997)。神話學 (Mythologies) (許薔薇、許綺玲譯)。台北市：桂冠。(原出版年：1957)
- 【Barthes, R. (1997). *Mythologies* (Qiang-Wei Xu & Qi-Ling Xu Trans). Taipei city: Guigu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7)】
- 米爾頓·弗里德 (Friedman, M.) (2009)。資本主義與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 (張瑞玉譯)。北京：商務。(原出版年：1962)
- 【Friedman, M. (2009). *Capitalism and freedom* (Rui-Yu Zhang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2)】
- 古林 (Gurin, J.) (2015)。開放數據：如何從無處不在的免費數據中發掘創意和商機 (Open data now: The secret to hot startups, smart investing, savvy marketing, and fast innovation) (張尚軒譯)。北京：中信出版社。(原出版年：2014)
- 【Gurin, J. (2015). *Open data now: The secret to hot startups, smart investing, savvy marketing, and fast innovation* (Shang-Xuan Zhang Trans). Beijing: CITIC Press Group.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4)】
- 莫斯科 (Mosco, V.) (1998)。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馮建三、程宗明譯)。台北市：五南。(原出版年：1996)
- 【Mosco, V.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Jian-San feng & Zong-Ming Cheng Trans). Taipei city: Wu N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6)】
- 席勒·赫伯特 (Schiller, H. I.) (1996)。思想管理者 (The mind manager) (王怡紅譯)。台北市：遠流。(原出版年：1975)
- 【Schiller, H. I. (1996). *The mind manager* (Yi-Hong Wang Trans). Taipei city: Yuan-Liou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 史蒂葛里茲 (Stiglitz, J. E.) (2010)。失控的未來：揭開全球中產階級被掏空的真相 (Free Fall) (姜雪影、朱家一譯)。台北市：天下文化。(原出版年：2010)
- 【Stiglitz, J. E. (2010). *Free Fall* (Xue-Ying Jiang & Jia-Yi Zhu Trans). Taipei city: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0)】
- 立法院公報 (2015年3月2日)。行政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104(13), 4-240。
- 【Legislative Yuan Gazette (March 2, 2015). *Xingzheng yuanzhang tichu shizheng fangzhen ji shizheng baogao*. 104(13), 4-240.】
- 行政院主計處 (2014)。2013年社會指標統計表。檢自：<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6477&ctNode=538&mp=4>
-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14). *2013nian shehui zhibiao tongjibiao*.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6477&ctNode=538&mp=4>】
- 行政院法務部 (2005年12月28日)。政府資訊公開法。檢自：<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20026>
- 【Ministry of Justice (December 28, 2005). *The freedom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law*. Retrieved from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20026>】
-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3)。政府資料開放增值應用研究分析書面報告。檢自：http://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33B27A62D5D08C83&sms=90CFF1BDB7A1494C&s=CFC266A607127C45
-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2013). *Zhengfu ziliao kaifang jiazhi yingyong yanjiu fenxi shumian baogao*. Retrieved from http://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33B27A62D5D08C83&sms=90CFF1BDB7A1494C&s=CFC266A607127C45】
- 行政院科技會報 (2012年1月16日 a)。政府資料變黃金—科技會報十八日舉辦公開資料增值策略會議。檢自：http://www.bost.ey.gov.tw/News_Content.aspx?n=5331137415276DD6&sms=4C8F2E9B5908645D&s=3D36234584127227

- 【Boar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xecutive Yuan (January 16, 2012). Zhengfu ziliao bian huangjin-Kejihuibao 18ri juban gongkai ziliao jiazhi celue huiyi. Retrieved from http://www.bost.ey.gov.tw/News_Content.aspx?n=5331137415276DD6&sms=4C8F2E9B5908645D&s=3D36234584127227】
- 行政院科技會報 (2012 年 1 月 18 日 b)。2012 我國公開資料加值 Open Data 推動策略會議「綜合討論引言報告」。檢自：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引言報告：臺灣公開資料加值的契機與挑戰_中文.pdf
- 【Boar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xecutive Yuan (January 18, 2012). 2012 wo guo gongkai ziliao jiazhi Open Data tuidong celue huiyi “Zonghe taolun yinyan baogao”。Retrieved from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UserFiles/引言報告：臺灣公開資料加值的契機與挑戰_中文.pdf】
- 行政院科技會報 (2015 年 2 月 5 日)。推動開放資料的回顧與展望，行政院科技會報第 3435 院會。檢自：<http://www.bost.ey.gov.tw/Upload/RelFile/1033/3263/db881a4b-681e-4de4-b916-b06fd7d12149.pdf>
- 【Boar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xecutive Yuan (February 5, 2015). Tui dong kaifang ziliao de huigu yu zhanwang. xingzhengyuan keji huibao di3435 yuanhui. Retrieved from <http://www.bost.ey.gov.tw/Upload/RelFile/1033/3263/db881a4b-681e-4de4-b916-b06fd7d12149.pdf>】
-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4)。政府開放資料加值營運模式之研究。檢自：http://www.teg.org.tw/web_zh/research/view.do?id=1362457511825&language=zh
-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4). Zhengfu kaifang ziliao jiazhi yingyun moshi zhi yanjiu. Retrieved from http://www.teg.org.tw/web_zh/research/view.do?id=1362457511825&language=zh】
-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b)。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檢自：<http://vbook.join.gov.tw/content/>
-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5). Wanglu zhihui xin Taiwan zhengce baipishu. Retrieved from <http://vbook.join.gov.tw/content/>】
- 宋餘俠、李國田 (2012)。政府部門資料加值推動策略與挑戰。研考雙月刊，36(4)，10-21。
- 【Song, Yu-Xia & Li, Guo-Tian (2012). Zhengfu bumen ziliao jiazhi tuidong celue yu tiaozhan. Yan kao shuang yue kan, 36(4), 10-21.】
- 李治安、林誠夏、莊庭瑞 (2014)。開放政府資料的基本原則與相關政策議題。公共治理季刊，2(1)，65-76。
- 【Li, Zhi-An, Lin, Cheng-Xia, & Zhuang, Ting-Rui (2014). Kaifang zhengfu ziliao de jiben yuanze yu xiangguan zhengce yiti.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2(1), 65-76.】
- 林安妮 (2014 年 12 月 23 日)。毛揆科技三箭 半年翻轉政府 運用開放資料、大數據、群眾外包 讓民眾對施政有感。經濟日報，A5 版焦點。
- 【Lin, An-Ni (December 23, 2014). Maokui keji sanjian bannian fanzhuan zhengfu yunyong kaifang ziliao, dashuju, qunzhong waibao rang minzhong dui shizheng yougan. Economic Daily News, A5.】
- 林安妮 (2015 年 1 月 29 日)。Open data 元年 毛揆指示加速推動 強化與民間合作 衛福部等遭點名不夠積極。經濟日報，A5 版焦點。
- 【Lin, An-Ni (January 29, 2015). Open data yuannian maokui zhishi jiasu tuidong qianghua yu minjian hezuo weifubudeng zao dianming bugou jiji. Economic Daily News, A5.】
-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2015)。全部資料集清單。檢自：http://data.gov.tw/data_list
- 【DATA.GOV.TW (2015). Quanbu ziliaoqi qingdan. Retrieved from http://data.gov.tw/data_list】
- 翁岳生 (1985)。資訊立法之研究。台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Weng, Yue-Sheng (1985). Zi xun li fa zhi yan jiu. Taipei cit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 財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2007)。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體檢「政府資訊公開嗎？」看臺灣民主程度。檢自：<http://www.east.org.tw/FCKupload/File/3-52.pdf>

- 【The Environment & Animal Society of Taiwan (2007). Min ke shi you zhi, bu ke shi zhi zhi? Tijian “zhengfu zixun gongkai ma?” Kan Taiwan de minzhu chengdu. Retrieved from <http://www.east.org.tw/FCKupload/File/3-52.pdf>】
- 張維志 (2014)。從資料需求看開放資料的產值。Open data 聯盟月刊, 6。檢自：http://www.opendata4tw.org.tw/article_detail.php?id=6&aid=44
- 【Zhang, Wei-Zhi (2014). Cong ziliao xuqiu kan kaifang ziliao de chanzhi. Open Data Alliance, 6. Retrieved from http://www.opendata4tw.org.tw/article_detail.php?id=6&aid=44】
- 郭耀昌 (2004)。電子化政府之正當性基礎：效率與回應性間的平衡。玄奘社會科學學報, 2, 1-34。
- 【Kuo, Yao-Chang (2004). The legitimate foundations of e-government: The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responsibilities. Hsuan Chua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 1-34.】
- 陳怡君 (2013)。開放政府資料迎接資料民主新時代。公共治理季刊, 1(1), 156-163。
- 【Chen, Yi-Jun (2013). Kaifang zhengfu ziliao ying jie ziliao minzhu xin shidai.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1(1), 156-163.】
- 彭宣雅 (2014年12月26日)。休耕4.1萬公頃 工業用水為何優於農業用水。聯合晚報, A4 版焦點。
- 【Peng, Xuan-Ya (December 26, 2014). Xiugeng 4.1wan gongqing gongye yongshui weihe youyu nongye yongshui. United Evening News, A4】
- 湯德宗 (2006)。政府資訊公開法比較評析。台大法學論叢, 35(6), 37-115。
- 【Tang, De-Zong (2006).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wan'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5.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5(6), 37-115.】
- 陳至哲 (2000)。我國電子商務軟體與應用市場商機分析。台北市：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 【Chen, Zhi-Zhe (2000). Wo guo dian zi shang wu ruan ti yu ying yong shi chang shang ji fen xi. Taipei city: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 周樹林、林子勝、許瓊予、陳至哲、陳佳賢、童啟晟...楊正瑀等人 (2003)。2003年電子商務產業年鑑。台北市：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 【Zhou, Shu-Lin, Lin, Yu-Sheng, Xu, Qiong-Yu, Chen, Zhi-Zhe, Chen, Jia-Xian, Tong, Qi-Sheng, ... Yang, Zheng-Yu (2003). 2003nian dianzi shangwu chanye nianjian. Taipei city: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 經濟部工業局 (2014)。Open Data 跨域整合年會 吳副總統比讚。Open data 聯盟月刊, 7。檢自：http://www.opendata4tw.org.tw/article_detail.php?id=7&aid=57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reau,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14). Open Data kuayu zhenghe nianhui Wu fuzongtong bizan. Open Data Alliance, 7. Retrieved from http://www.opendata4tw.org.tw/article_detail.php?id=7&aid=57】
- 葉俊榮 (1996)。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之研究。台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Ye, Jun-Rong (1996). Zhengfu zixun gongkai zhidu zhi yanjiu. Taipei cit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The Open (Government) Data of Neoliberalism Perspective and Dilemma of Commodification

Chao-Mou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R.O.C)

E-mail: exercise@cc.shu.edu.tw

Keywords: Open (Government) Data; Information Policy; Neoliberalism; Commodification

【Abstract】

Recently open (government) dat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liberalism, public sector emphasized the accumulation wealth of nation can through data release and access. This view led open (government) data to the forms of commodification in pursuit of economic value and benefit, player-as-referee operational mode, and promoted trickle down of economic outcomes. This article combing the process of Taiwan official promote and dilemma of commodification by text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open (government) data must focused on user requirements and social justice, constructed innovati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but not priority to commodification.